

崔 波 / 著



周易 解说



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周易解说

崔 波 著

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周易解说

著者：崔波

出版发行：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香港上水新成路一百二十三号二楼

电话：二六七〇六六三三

传真：二六七〇一三八二

印刷者：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定价：港币六十八元

人民币六十八元

二〇〇二年十二月初版·香港

翻印必究



版權所有

ISBN 962 - 450 - 297 - 8/D·45138

前 言

《周易》是中国最早最重要的典籍之一，在中华文化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儒家尊之为“群经之首”，道家崇之为“三玄之一”。此书产生的历史，充满美妙的神话传说，从来令人神往。其探赜索隐、玄思宇宙的深奥哲学和象数图式，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独树一帜的，令古今中外不少思想家、政治家、科学家、术数家为之倾倒。《周易》蕴涵着多方面的文化价值，在中华文化史上占有特殊的历史地位，受到普遍推崇。思想家们看重其大化“流行”，阴阳“对待”，日新“生生”的哲学理论，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智慧，称之为“辩证的宇宙代数学”；政治家们推崇其“崇德广业”的政治开拓意识，“居安思危”的时代忧患意识，“顺天应人”的社会改新意识，视之为打开宇宙迷宫之门的金钥匙。易学中的河图、洛书、太极图以及卦气、纳甲、爻辰诸说，为古代术数之学提供了思想基础和象数推演程式，发挥了沟通精英文化和神秘文化的桥梁作用。

3000 多年来，《周易》和易学的精深义理和奇妙象数，在中华文化史上，一脉相承，不断发展。历代易学著述，数以千计，形成浩瀚的易文化思想海洋，令人望洋兴叹。具有广泛实用性的易学思想，渗透到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它同文学、史学、哲学、自然科学（尤其是中医学），以及术数之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对定于一尊的儒家思想固然有深刻的影响，在道家、法家以及道教、佛教思想中，也打下了或浅或深的烙印。也就是说，数千年来，从帝王将相到贫民百姓，从鸿儒博生到江湖术士，从世外高人到凡夫俗子，一直对《周易》抱有浓厚而广泛的兴趣。无论是国家治乱兴衰，

还是个人生死得失，人们总企望从《易》中找到合理的解释，企望借《易》以趋吉避凶。《周易》为什么能有如此强大、永恒而普遍的魅力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从以下几方面略作阐述

一、八卦的产生

《周易》古经由筮和卦两大部分构成。据《左传》僖公四年有“筮短龟长”一语，知筮先于卦产生。卦又分为八卦和六十四卦，八卦在先，然后重为六十四卦。八卦产生的下限，不会晚于夏代，因为《周礼·春官·大卜》明言《连山》已具备八卦、六十四卦，而《连山》一般认为是夏代《易》书。那么八卦产生的上限呢？《系辞传》有包牺氏仰观俯察始画八卦之说。其实此说值得怀疑。北宋欧阳修作《易童子问》曾提出疑向，但是未能深究。直到今日相信此说的仍大有人在。据著名史学家、易学家金景芳先生考证，《系辞传》中关于包牺氏画八卦及河出图、洛出书的话是后人窜入的，非孔子之旧文，不可信据。

八卦不可能是包牺氏所画，它的产生不会早于唐尧时代。这从天概念的变化可以得到证明。远古中国人对天的认识曾经有过一次革命性的变革。完成这一变革的显著标志就是八卦的产生。八卦这八个符号有着深刻的世界观意义。根据《说卦传》的解释，八卦反映的完全是一个真实可信的物质世界。天与地，与雷风水火山泽等实物并提，这里的天具有健的性质，显然是自然之天。这就是说，朴素唯物论的天概念，是八卦产生的前提。什么时候有了确切的自然之天的天概念，什么时候就有了产生八卦的可能性。

包牺氏时代原始宗教意识弥漫，人们心目中的天是神的世界，八卦的产生无从谈起。由神主宰之天向自然之天转化，是在尧时完成的。尧时阴阳历产生了，取代了已经落后的火历。以前人们心目中的天除了那个大火以外便是神，而现代太阳及其永恒无差

忒的运转成了天的实质性内容。对太阳的认识和理解是形成自然之天的天概念的关键一步。后人早已明确地指明了这一点。《礼记·郊特牲》所说：“大报天而主日”和《汉书·魏相传》所说：“天地变化必由阴阳，阴阳之分必以日为纪”的说法就是极好的证明。

唐尧时代正式产生了以日月为主体的阴阳历，《尚书·尧典》“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的记载，其意义不可低估。历是推算，象是观象。星与辰是一事，即后来逐渐认识的经星二十八宿。经星二十八宿相当于布满天空的座标，用以显示日月的行踪，发现它们在某些恒星星座上有规律的定期交会，一个广阔的天体世界在人们面前展开了。这个新世界的界限虽然不知道，它在大地上大地之外却是清楚的。于是天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同时发生变化，内涵由大火和神转向日月星辰，外延则延伸到广大的天体。于是“昊天”这一显赫的名称被发明出来。昊天是以日月星辰为主体的自然之天。有了这样的天概念，才可能产生阴阳的概念，产生乾健坤顺的概念，从而才可能画出八卦来。

如果把筮的问题不计，那么不会早于唐尧时代产生的八卦便可视作《周易》哲学的起点。孔子思想的源头也正在这里。孔子编次《尚书》“独载尧以来”，黄帝百家语一概不取。《中庸》记“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尧舜以前亦一概不取。孔子为什么这样，仅仅用孔子治史取舍谨慎作解，恐显不够，还应考虑到人们对天体自然的理性认识开始形成于唐尧时代这个事实。孔子继承并发扬的正是唐尧时代产生，反映在《周易》八卦中的朴素唯物论的思想。

八卦和六十四卦的卦象由阴(--)、阳(—)两个符号依不同次序组合。八卦指：乾(☰)、坤(☷)、坎(☵)、离(☲)、震(☳)、巽(☴)、艮(☶)、兑(☱)，代表天、地、水、火、雷、风、山、泽八种物质性的东西，远古之人认为这是构成宇宙万物的八种基本物质要素；六

十四卦,每卦六爻,分别由两经卦组成。六十四卦有一定的先后次序,卦序中包含有深刻哲理,其中否泰、剥复、损益、鼎革、既济未济等卦,从卦名即可看出其有着对立统一的关系。每卦六爻,又组成一套独立的系统结构,内部存在着贞悔、三才、比应、承乘、互体、旁通等关系。

二、《易经》和《易传》

《周易》分《易经》(狭义)和《易传》两部分。《易经》大约于殷周之际编纂而成,由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符号系统和卦辞、爻辞的文字系统组成。其卦爻符号系统是在长期的原始卜筮中逐渐把数与形整齐化、有序化、抽象化的结果,具有稳定性和规范性。其文字表意系统将筮占记录的素材整理改造,系附于卦爻之下,赋予卦爻符号以丰富的内容和广泛的信息。《易经》继承了原始的巫术文化传统,反映了殷周之际宗教思想的变革,将当时以德配天的天命神学观念和卜筮相结合,构成一个以天人整体观为理论基础的巫术操作体系,使其迷信成分有所减少,理性成分有所增加,扬弃了原始筮占那种单纯根据蓍草排列以定吉凶的低层次思维模式,在蓍与卦的外壳下蕴藏一定的哲学思想。《易经》还反映了殷周之际人们的精神风貌,以及当时所具备的历史、科学、政治、伦理等知识。它体现了先民以卜问形式、卦爻结构解释客观事物变易规律的企图和寻找宇宙因果联系的努力。

《易传》是指《彖》上下、《象》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杂卦》共十篇,亦称“十翼”,是对《易经》的解释性著作。它使《易经》从巫术转变为哲学,从迷信转变为学术。它以《易经》框架结构为表现形式,提出了一个包括天道、地道和人道在内的、关于自然和社会普遍规律的哲学思想体系。尤其需要一提的是,关于《易传》的作者问题一直众说不一,在此欲述浅见。我比较赞赏金景芳先生和吕绍纲先生对此问题的看法,那就是《易传》应

是孔子所作,《传》和《经》是一个整体,不能割裂开来对待。《周易》的经文部分是在很长时间里经过多人之手逐渐作成的。这一结论已得到大家的共识。卦爻辞作于殷周之际,由于《系辞传》有明确的交代,也可以肯定无疑。后世人明言卦、爻辞文王作或文王、周公分别作,也不能说毫无道理。总之,经文的作者问题不是很大。问题大的传文作者究竟是谁?《史记》、《汉书》并言孔子作。北宋欧阳修提出质疑,以为不是孔子作。其理由是《周易》传文文字繁衍丛脞,内容自相乖戾,不似圣人手笔。他的见解一半可贵,一半可议。《周易》传文确实存在他提出的问题,前人没有人敢触及,他第一个提出,极为可贵。但他的思维方法仍未摆脱传统的束缚,即既云圣人孔子作,便不可以有懈可击。他更忽略了先秦古书是写在简策上,辗转抄袭,错简、讹误、窜入后人语在所难免的事实。他还不曾注意到先秦古书之所谓作与后世有所不同。说孔子作,但谓主要部分出于其手,思想属于他,不必字字句句都由他一人写定。事实上,《周易》传文的构成,相当复杂,有些是孔子采纳的前人旧说。如《文言传》“元者善之长也”那一段文字,《左传》襄公二年妇人穆姜讲过,显然不是孔子的发明。《系辞传》“大衍之数五十”一章记载古代的筮法,绝对是孔子以前的成说。有些是孔子弟子记录的孔子语,如《文言传》题“子曰”的那些文字。有些则是后世人转抄时窜入的,除上文言及包牺氏画八卦说以外,《系辞传》“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一段,极令人生疑。欧阳修《易童子问》分析得很深刻。谓既言圣人仰观俯察作八卦,又说天赐图书,圣人据以作八卦,岂不自相矛盾!今日看来最合理的解释是,包牺氏作八卦和河图、洛书两说乃后世人窜入的东西,非《周易》传文原物。

《周易》传文除前人旧说,后人窜入,弟子记录孔子语外,其余大部分应是出于孔子手笔:《序卦传》、《象传》、《彖传》、《系辞传》、

《文言传》中的大部分,属于这种情况;《说卦传》关于八卦取象的部分则是前人旧说。总之,《史记》、《汉书》谓《易传》孔子作,不误。《史记》是信史。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受《易》于杨何,杨何是孔子《易》学的九传弟子,汉初传《易》的大家田何的再传弟子,武帝朝的《易》博士。司马谈的《易》学渊源有自,由来不虚,由他传授给司马迁之孔子作《易传》的旧说,焉有不实之理。况且《史记》的记载与《论语》如出一辙。《孔子世家》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述而》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只是未将孔子作《易传》的事情明说出来,而《史记》则说得明确无疑。帛书《易传》之《要》篇有孔子“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一语,与《孟子·滕文公下》所记孔子说“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语意相似。《春秋》是他作的,所以担心后世乱臣贼子咒骂他。这里又说后世之士会因《易经》而怀疑他,岂不等于暗示《易传》是他作的。倘若他未在《周易》书中留下文字痕迹,后人根据什么疑他?

《易传》的思想体系与孔子思想吻合,是《易传》孔子作的最有力的证据。《周易》是一部哲学书,卜筮是它的形式。研《易》是研究它的义理,但对象数也应有所认识。《易传》对《易经》这一基本看法和态度与孔子一致。再一点,孔子本人极重时变,孔子自称“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论语·微子》),《中庸》也记孔子强调时中,孟子则称孔子是“圣之时者”(《孟子·公孙丑上》)。《易传》最贵时,《彖传》、《系辞传》把时视作卦爻的本质,它总是告诫人们如何通过观卦把握时变。

《易传》把《易经》作为哲学著作研究,特别看重《易经》哲学的时变,证明它的作者是孔子。除了孔子以外,在春秋晚期以至整个战国时代找不到另外一个或几个有可能写出《易传》这样作品的思

想家，因而《易传》的思想只有安在孔子头上最合适。

此外，《易传》继承和发展了取象说、取义说，提出包括当位、应位、中位、趋时、承乘、消长、卦变等多种形式的爻位说，以此解释卦爻辞的吉凶休咎，第一次将《周易》内容逻辑化、系统化。《易传》将“阴阳”看作是表述自然界普遍联系的基本范畴，阴阳不仅是两种气，而是事物的属性，以阴阳阐释卦爻象及事物的根本性质，说明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重性。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命题，认为天地万物到人类均存在着相吸引，或相排斥的关系，对立的事物又具有统一性。一切事物的复杂性（“天下之至赜”）和变动性（“天下之至动”）都受阴阳对立统一规律的制约。

与《老子》不同，《易传》强调刚健的作用，提出一套以“自强不息”为特点的辩证法思想。《易传》提出的阴阳、太极、两仪、道、器、神、几、言、意、象等哲学范畴，对后世哲学发展具有深刻影响。

三、易学及其发展历史

《周易》问世后，最早见于《左传》记载，在鲁庄公二十二年，即公元前 672 年。近 3000 年来，研究《周易》的代不乏人，为阐述易理而留下的易学著作，不下 3000 种，形成了独立发展的易学史。所谓“易学”就是历代学者对《周易》的种种解释，这些千差万别的解释，形成了一套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理论体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易学归纳为义理、象数两派和汉儒卜筮，京房，焦延寿机祥，陈抟、邵雍图书，王弼“说以老庄”，胡瑗、程颐“阐明儒理”，李光、杨万里“参证史事”等六宗。认为：“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这些话并非虚夸。《周易》可谓是博大精深的古代智慧和知识的宝库。“无所不包”说明易学外延的无限大，反映了《易》对文化各层面的影响；而“易道”则是易学最本质的核心层次，代表了中华文化的根本精神。

先秦易学。先秦时期是易学萌生和奠基时代。传统认为《连山》、《归藏》、《周易》“三易”先后于夏、商、周三代问世。春秋战国时期易学已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势,一是继续沿着宗教巫术的占筮道路发展,以《左传》、《国语》为代表;一是摆脱宗教巫术束缚而向哲学发展,以《易传》为代表。《易传》是先秦易学集大成之作。先秦诸子尤其是儒家、阴阳家、道家的思想反映在易学上,丰富了易学;同时,《周易》思想又渗透到各家学说之中,成为社会的普遍价值观。

两汉易学。两汉是华夏文化形成和定型的时代,治易之风大行,出现三种解易倾向:一是孟、京易学,孟喜、京房创卦气、纳甲、飞伏说,建立了象数易体系,为今文易学。二是费直易学,注重义理阐发,为古文易学。三是严君平、扬雄易学,将易学同黄老学说相结合,以道家黄老之学解《易》。三种倾向中,以孟、京象数派影响最大,代表了汉易主流。东汉郑玄兼采今古之长,采用爻辰说以注《易》。与郑玄儒家解易系统相对,《周易参同契》则代表道家黄老派解易系统,以《周易》原理解说炼丹理论和方法,将卦气说发展为月体纳甲说,对《易纬》天人感应说和阴阳灾变说加以扬弃,它是以易学指导其他学科的范例。早于《参同契》而于西汉成书的《黄帝内经》则开创了易学与具体科学(医学)结合的先例,反映了易学对具体科学的推动、指导作用。

晋唐易学。受魏晋玄学的影响,以王弼易学为代表,扫象言理,将易理玄学化,开《周易》义理派之先河。王弼作的《周易注》和《周易略例》在理论上对汉《易》象数派进行清算,使在两汉 400 年中不绝若线的义理《易》学得复兴、壮大。隋唐时期,出现孔颖达《周易正义》、李鼎祚《周易集解》等总结前人和时人易学成果之巨著,虽然前者偏重魏晋义理;后者偏重汉代象数,但已呈现融合两派易学的倾向,代表儒家解易阵势。

宋代易学。宋时,《周易》被当作对抗佛道二教的有力武器,而成为宋明理学的理论依据。以程朱易学为代表,沿义理派发展,将易学伦理化,程颐以儒理解易,而力排老庄玄学。南宋朱熹作《周易本义》,重义理而不废象数,以程氏易学为骨干,融各家之所长,集理学之大成,将易学哲学中宇宙生成论体系转变为理本论体系,以二气变化法则解释宇宙变化规律,对儒家哲学作出了重大贡献,成为其后代官方哲学的代表。同时兴起以邵雍为代表的先天象数学派,将河图、洛书引入易学,使《周易》日益神秘化,以致其末流同江湖术数混杂在一起。

明清易学。这一时代,统治者对臣民加紧思想控制,在独尊程朱理学的同时,大兴文字狱。明代钦定了宋学的统治地位,其易学以宋易为主流。明末清初王夫之掀起明清时期宋易义理研究的最后一次高潮。随着图书象数学被批判,宋易逐渐被以考据学、训诂学为特征的汉易所代替。清代汉易重视实据,考订文字,在对《周易》经传文字的注释、考据、辑录、校讎方面做出了贡献,然而对《周易》原理的探讨终未摆脱汉易窠臼,没有形成自己所特有的哲学体系。

近代以来,《周易》在科学方法指导下被人们重新认识和研究。现代易学,在义理、象数两方面都各有深入,呈现出以现代科学理论为指导进行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综合交叉研究的趋势。同时,不少现代自然科学家热心加入易学研究行列,力图将《周易》象数与现代科学相结合,势必将形成异军突起的科学易学派。

当代《周易》研究的前景是十分广阔的。随着历史的推移和科学思维的发展,它不断地向不同时代的人们发出不同的信息,启发和诱导人们去创造生活。美国国际易经研究会主席、夏威夷大学哲学系主任成中英教授 1987 年在山东济南国际《周易》学术讨论会上谈到《周易》研究的趋向时认为:“易经代表了一种哲学思想,

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易经哲学是中国文化的正统,是整个文化综合而成的结晶。占筮不能仅从浅层迷信方面去理解,卜筮现象背后有其一套合理的逻辑、理论,有其现代意义。易经、占筮实际上是一种预测学,它着意的是由现在透视未来,从而参与未来,是预测和决策的统一,是人类的一种自然需要……在易的发展过程中,早期的单向预测学说,到《易传》则发展为一种宇宙科学、智慧。易经成为一种创造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的学说。它所追求的既是整体又是开放,又是运动的思想体系;既是发展又是最平稳的人类社会。《易经》具有历史性、现代性和未来性,有其世界性的意义。”(参见毕群圣主编:《大易论集摘要》第18页,山东友谊书社1990年出版。)

四、关于《周易》热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关心《周易》的人越来越多,确实形成了一股《周易》热。表层上的《周易》热,是利用国人对易学的关注和重视,自称“破译”《周易》的人相继出现,先是自称“破译”八卦者,后是自称“破译”河图与洛书者,接着,热的真正交点——“预测学”又出现了。“预测学”实际上是讲的《周易》筮法,更具体些,是讲的西汉人京房的“纳甲”法,其次还有“梅花易数”“四柱命理”等等,严格讲,后两种只是“援《易》以为说”了。故自1984年武汉《周易》学术讨论会后引发的中国《周易》热,后来很大程度上变成了筮法热。兼之丰厚的利润,诱发一些出版部门专出筮法及与此相关的书籍,一时书市上此类书籍五花八门,泛滥成灾。江湖术士借此而起,又进而将“筮法热”变为“算命热”。因而算命热与《周易》热混在一起,以致后来很多人以为“八字”“梅花易”等算命术就成是“研究周易”的了。

从前,江湖上算命卜卦与《周易》研究根本扯不上边,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及七十年皆如此。进入80年代,随着《周易》热的兴

起,江湖上的算命人为了谋生(因为算命受到禁止)于是纷纷改换门庭,将自己卜卦算命说成是“研究周易的”,兼之占筮之书充斥市场,久而久之,《周易》与算命竟混在一起,弄假成真了。当然,这种“《周易》热”必然会带来一些极不健康的成分:首先是粗制滥造的占卜之书大量充斥图书市场,很多人只要见到占筮之书,不问其内容有无价值就买,很多江湖术士借此招摇过市,将其骗财活动说成是:“研究《周易》”;其次是更有人成立“咨询公司”,假借《周易》之名行骗财之实。还有人到工厂企业给主管人员看面相,批八字,看风水,完成此“服务一条龙”后,收取高昂费用。并将此美其名曰“《周易》与企业管理”等等。这种人数量不多,但破坏力极大,给《周易》研究造成极坏的影响。1995年经过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介的不断曝光,这种“人才”稍稍有所收敛。

尽管出现如上不健康的现象,但真正的学术研究近20年来也取得了不少成果。学术专著和论文纷纷涌现,学术会议、学术团体应运而生,使《周易》研究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新的进展,其特点表现在:第一,《易》象数学(包括河、洛之学)得以复苏。长期被冷落、被荒芜,乃至被斥为糟粕的《易》象、数、图学,重新得到了广泛的重视。研究者们不仅对汉易诸家象数,而且对魏伯阳、陈抟、邵雍、朱震等所传的先天图书之学,以至方以智父子、戴震、焦循的数理哲学,都分别给予了文献学的考订和科学的疏理;而且,由于现代科学视野和方法的引进,使整个《易》象数学似已获得再生的活力。

第二,与《易》象数学的复苏相联系,表现了“科学易”的兴起。对《易》象、数、理、图中的数理、物理、哲理的研究,有的同志将其纳入现代科学的语境和视野,引进现代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加以现代科学的透视和诠释。从而使一些曾被神秘化了的数理和原理、矩阵或图式,得到一定的科学化的说明,古老文献焕发出青春的光辉;这样被现代科学眼光照亮和说明了的《易》象数模式和推理方

法,还可以反过来应用于现代科学研究的某些领域,并使之得到一定的验证和丰富化。这样生长出易学研究中一个新的学派——科学易,可以说这是当代易学发展中的一项特殊成就。

第三,“考古易”的研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地下考古新发现提出的新课题。1984年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周易》的公布和于豪亮、张政烺先生专论的发表,周原甲骨上数字卦的发现和徐锡台等先生的初步研究,可以说是对易学考古新发现研究的开端。这些年,研究成果大为增加,主要是研究质量有提高。尤其对帛《易》的研究,邓球柏、张立文两位教授分别对帛本《易经》作了详尽的注释,对帛本《系辞》,楼宇烈、王葆玟、李学勤等都提出了可贵的见解。廖名春对帛本《易传》的整理作了很多可贵的工作。

第四,与“科学易”相对应的“人文易”通过易学及哲学史的研究而受到重视,并自觉到“人文易”并非晋易、宋易中义理内容的重复,而应是对义理派、象数派的双向超越。“人文易”也是时代的产物,是现代人文意识对易理的渗透和诠释。“人文易”的研究,旨在古今贯通地展示易学中构成传统文化心理深层的人文意识、价值思想、精神追求等。苏渊雷先生重版的《易学会通》中,把“生、感、变、反、成、时、中、通、进、忧患”等十个范畴作为论纲,对“人文易”的探究,有开拓之功。张岱年先生一再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是渗透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基本精神,是我们民族经受各种苦难而得以发展的强大内动力。

针对《周易》热,洪丕谟先生认为,诞生于3000年前的《周易》,是古人研究宇宙哲学、人生哲学、社会哲学乃至占卜、预测人生的著作,位居《论语》、《孟子》等十三经之上。为儒家群经之首。因此数千年来风行不已。《周易》研究分“义理”和“象数”两派,前者着重伦理阐述,经世治国;后者重视以卦象预测人生,探测吉凶,推知未来。《周易》探索自然规律,预测人生未来,有一些科学的成分,

其中既有阴阳变化,对立统一的哲学成分,又有学术、文化研究的科学价值。目前社会上形成的《周易》热,总体来说反映了弘扬民族文化积极的一面,但也折射出一部分人失落、茫然的心态,这些人试图通过预知祸福,精神上得到满足或解脱。洪先生这种观点十分贴近笔者的思路。

对于《周易》热,相信只要驱除迷雾,还其理性,我们也大可不必视其如洪水猛兽。对于学术界来说,从学术、文化研究的角度进行合理的引导,当也不失为一种明智的做法。

五、《周易》与管理

在本书中,对卦辞、彖辞、大象辞、爻辞均从管理学角度作了阐释,因而有必要对《周易》与管理的一些问题作一说明。

《周易》的管理是一种整体的管理观。我们看到,在中国历史上,这种整体和谐观念作为一种管理思想并没有完全实现过。因而《周易》的管理观念和基本原理与封建专制的管理思想体系,在相当深刻的历史意义上是相对立的,却与现代表管理思想在精神上有种种相通之处。而《周易》本身所包涵的那种富于辩证精神的整体管理观只有在现代社会里才真正有付诸实践的可能性。作为“管理易”具有代表性的学说模型是北京机械管理学院的丁善懿教授提出来的。其要点为:

(一)太极——太极是一元宇宙的两面。不仅宇宙是太极,国家、企业乃至个人都是一体两面的太极整体。在企业中,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相处,产生既相对又互补的运动,此方之进须顾及彼方之退才能形成均衡中和,使企业获得最大效益的目标与重视人类本能的自尊和价值在更高的整体层面(即太极)上相须而进。

(二)两仪——两仪乃生于太极的阴阳两面,阴阳概念可用于很多人类事物,用以表达事物存在和变化的种种并存或对立的关系,其中当然也包括管理。最有效、最符合易理的管理方式,莫过

于管理者(设为阳)与被管理者(设为阴)共同参与中道管理。这种管理观念西方称做“中庸”管理,日本人则称之为“拿中间而照顾两端”,这些观念与《周易》“致中和”原理和“安人”概念可以互为阐发。

(三)三才——天、地、人合称三才。管理的思想基础属于“三才”的范畴,强调善用四M(机械设备、原材料、制造方法和人力劳务,其英文词字首均为M)资源,尤其是劳务或人力资源的运用。前两者属自然(已经人化了的自然)的方面,后者属于社会和人的方面。管理中自然的因素和社会的因素是不能割裂开来考虑的。此外三才还与管理上三种相关又不相同的要素,即需要、目标和行为相关。

(四)四象——在《周易》中四象为老阳、少阴、少阳、老阴。亦可为四时、四位。在管理中可以理解为观察审度的四种视角和四种时空情境。当管理者面对问题时,要考虑时空变易的四象环境来执“经”、用“权”、达“变”,即要统筹兼顾,握权不离经,考虑内外环境的变易,适时适度和因时因地制宜。

(五)五行——管理动态必须具备五种职能:计划、组织、人事、指挥和控制。管理幅度原则上五人互助最宜,这种原则特别注重管理的整体系统中的个体教育水平和修养的发展,为管理之“经”;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的职能属于“权”,是管理过程小的变易部分。

(六)六爻——六爻按时位自下而上,由内而外递进,合乎管理的基本程度。管理中的一切数据、决策、信息、沟通……是由下而上,由内而外,从基层反映到上层。在管理中高层、中层、基层各居天、人、地爻位。中层(为人位)是第一线管理者,地位十分重要,其管理职能完善与否关乎管理全局。

(七)七政——管理变易的七个准则,其重点是顺应自然的变